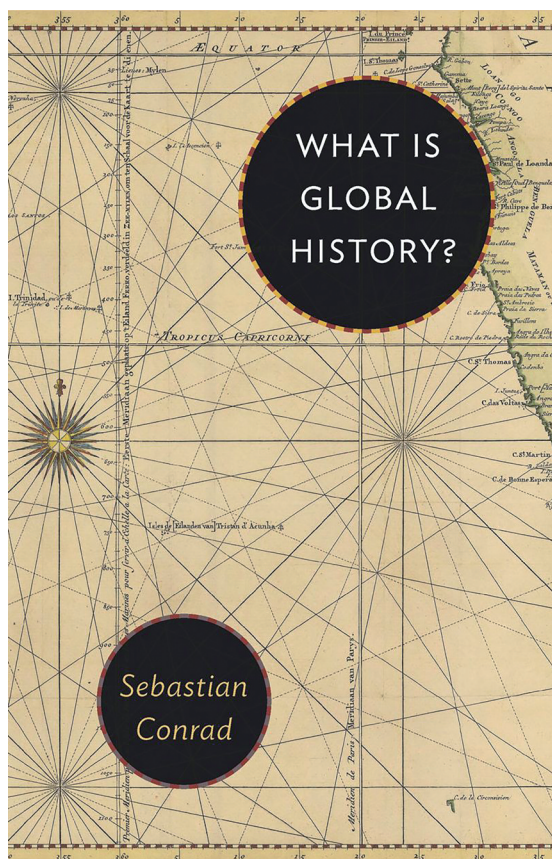


# 全球史與東亞研究的對話：

訪談全球史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

(Sebastian Conrad)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陳恬緣 賴焯妍 曾昭鈺 張存一 葉宇軒 柯采元

古今論衡 第 42 期 2024.6

訪談緣起：

二〇二三年三月，中研院史語所禮俗宗教研究室與文化思想史研究室邀請德國全球史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 (Sebastian Conrad) 蒞臨臺灣演講。在吳孟軒與李峙暉先生的鼓勵下，我們幾位有志於世界史和全球史研究的學生，決定藉此難得的機會進行一次深入的訪談，向康拉德教授請益有關青年學子在全球史領域的發展建議。康拉德教授慷慨答應在他返德後，可以讓我們從線上訪問。在與康拉德教授的接觸到最終完成訪談的整個過程中，我們體會到他與學生對話的耐心，以及對全球史研究的深刻見解。這次珍貴的學術交流讓我們這些志在投身相關領域的學生受益匪淺，也期待這篇訪談稿能夠惠及學界。

訪談日期：2023年4月21日

團隊成員：

陳恬緣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賴炯妍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曾昭鈺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張存一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二年級)

葉宇軒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一年級)

柯采元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五年級)

Q: Interviewer

A: Professor Conrad

Q: 讓我們從您的學術背景開始，我們查閱您的簡歷得知，您曾經接觸過東亞研究一段時間，您是否曾經將自己定義為東亞研究的歷史學家？是什麼原因促使您轉而研究全球史呢？

A: 過去以來我一直研究東亞史，但坦白說，我主要專攻日本史。雖說如此，我從未將自己定義為東亞史或日本史學家。這可能是因為在德國，以及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學院體制，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實際上意味著你要研究自己國家的歷史，而日本史並不屬於這個研究範疇。歷史基本上被定義為德國史，一定程度上也是歐洲史。因此，在體制內，研究日本、中國、韓國、臺灣和東亞歷史的學者們通常會從屬於區域研究。我從未真正在區域研究內，而是屬於歷史研究。這意味著我不能簡單地說我是一名東

亞歷史學家，因為我還必須研究歐洲，否則，我在歷史領域中將永遠沒有辦法獲得職位。這就是一種「雙軌並進」(two-legged approach)的方法，我的意思是，我必須兩者兼顧，我對東亞感興趣，但我也必須是歐洲史的史學家。

這種「雙軌並進」迫使我思考一種將這兩個地理區域整合在一起的方法。因此，我並沒有把自己定義為德國歷史學家或日本歷史學家，而是在很早便嘗試找到方法，將它們整合在一個分析框架內。最初，比較史似乎是最有希望的方向。然而，在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已經有一場大辯論，批評比較史在某些方面只是雙倍的國別史，比較史將國別框架翻倍，卻仍以典型的平行視角研究這兩個國家。隨後，出現了各種關於「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或「跨歷史」(我的法國同事稱之為 l'histoire croisée)的爭論。

對我個人而言，後殖民研究是在一個分析框架內思考世界不同地區最有成效的框架。例如，安·勞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和弗雷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帝國的張力》(*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1997)<sup>❶</sup>是一本編著合集，它促使研究者們在同一個框架內思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問題。我覺得它非常有吸引力，因此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投入於後殖民研究中。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自己的全球史研究就是從這種後殖民軌跡中產生的。

我覺得全球史是一個更加寬廣的框架，在這個框架內，我們不僅可以思考世界的不同地區，還可以分析它們之間的系統性或結構性的聯繫，即使它們之間直接關係並不是那麼緊密。例如，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比較了二戰後日本和德國的歷史學家，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對方，我的意思是，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很明顯地，在冷戰早期，有更廣泛的脈絡決定了日德兩方的處境，即便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對我來說，去探討這個攸關兩國發展的全球脈絡，是一個有啟發的取徑。因此，同時從事日本和德國的研究引導我不將自我定位為德國或日本歷史學家，而是尋找介於兩者之間或超越兩者的方法。

Q: 感謝您的分享，我覺得這真的很吸引人。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臺灣和歐洲學院的體制，如您所言，在歐洲想成爲一名歷史學教授，需要具體研究特定歐洲國家的歷史；而在臺灣，情況不同，只要有博士學位，我們可以成爲任一國家的歷史學家。或許，這與全球史發展的趨勢有某種聯繫，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史的發展爲新生代的歷史學家開拓了職位。我們現在可以說，我們是全球史學家，而不必成爲一個特定國別的家。在第一個問題中，您評價了自己從博士生到現在成爲歷史學家的學術歷程，下

❶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一個問題是：從您的職業定位和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您如何評價過去十年全球史的發展？

A: 如果我回想一下，全球史這個詞真正出現大約是在二〇〇〇年、二〇〇二年左右，我想那是第一批使用這個詞的書籍出版的時候。我記得在二〇〇七年，我和兩位同事一起創作了一套德語叢書，我們決定將其命名為「全球史」。但後來我們覺得這幾乎是自以為是，也許有點瘋狂，因為我們覺得這個詞太大了，那是在二〇〇七年的事，我想現在沒有人會對這套書被稱為全球史感到驚訝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的學科發展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和轉變。當時的全球史（距今二十年前），被視為只有已經接近退休年齡的學者才能做的事情，接近退休年齡的學者才能有自己的智慧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並將其他人寫的東西綜合起來。

現在，全球史是一個有效的研究領域，它是一個學生可以寫博士論文，甚至碩士論文的領域。而這些論文也是全球史領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說，它在許多方面甚至成為了主流，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每個學者都會做的事情。這並不意味著它是霸權，但它作為某種程度的主流確實已經到來。這個發展有利有弊。一方面，我認為缺點之一是，有時全球史議程的某些部分被淡化了。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至少在他們的文章或演講的副標題中，會使用「全球」（G word）。他們會說這都是全球性的。但有時似乎，只是介紹某個特定主題，而不是全球性的。因此，這就導致了一個非常模糊的情況。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使用這個詞，導致全球史不是一個非常有分析力道的術語，它現在更像是一個引起注意的詞彙或類別。另一方面，好處是這個領域本身已經專業化了。當然我們仍然有一些綜述性的作品，但我認為，至少在學術界，現在提起全球史，大多數人想到的是學者們在一手史料的幫助下研究特定主題，而不僅僅是基於二手文獻的鳥瞰式研究。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和重大的發展，這意味著人們的注意力已經從宏觀研究轉向微觀研究，朝向非常具體和實在的項目。以上，是最概括的全球史學科發展。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在過去五、六年左右的時間，該領域的整體政治也發生了轉變。在這一概念出現的早期階段，全球史的定義幾乎是全然樂觀的，它通常與歌頌人群移動的某種聯繫有關——有時甚至是意外的聯繫都被頌揚——因為它可以顯示世界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全球史畢竟是與全球化聯繫在一起的整體樂觀主義（optimism）的一部分。我認為這產生了兩種影響。首先，在分析的層面上，學者們能夠將聯繫本身視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甚至不問這些聯繫實際上意味著什麼，而只是簡單地建立聯繫，這似乎是當時發表的許多文章的目的和目標。其次，從政治上講，這與對全球聯繫——即使不涉及全球市場——的解放潛力的整體樂觀相關。然而，不論從北大西洋的觀點來看二〇一六年的川普和英國脫歐，或是從巴西、菲律賓

和中國等國的發展來看，全球化受到挑戰，我們面臨愈來愈多的障礙，這也影響了全球史領域。因此，我認為現在的學者愈來愈不願意簡單地歌頌全球聯繫，他們現在不再關注人的流動性，而是關注戰爭、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全球聯繫所產生的暴力。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純粹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意味著全球史的「稚嫩階段」已經結束，而轉變成一個更為成熟複雜的領域。近年來，批判全球化及其負面影響的觀點已成爲全球史的重要部分，我認爲，這是一個好的發展。

Q: 謝謝您從政治的角度將全球史的學術發展和全球化結合討論。您提到有一股從捍衛全球史到批評全球史研究取徑的潮流，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這樣的爭論或主張如何影響全球史研究呢？是否促使您或其他全球史家產生不同的見解？

A: 我想這涉及到兩個不同的議題，希望我能回答到你的問題。全球化和全球史很明顯地具有密切的關聯，但是它們兩者並不相同。所以就一方面來看，我認爲在過去五、六年中，人們對全球化抱持著更加批判的態度，而且質疑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存在的觀念，亦即世界將朝著更為緊密連結和相互牽連的方向發展。隨著民粹主義運動在世界許多地方興起，以及極端民族主義（ultra-nationalism）等因素的影響，這種批判的觀點變得更加強烈。這也意味著全球史家現在以不同的眼光來看待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的進程，他們採取更加批判性的態度，認爲全球化同時帶來越來越多的趨同與分化。過去我們天真地認爲，世界越是緊密連結，產生的聯繫就會越多，我們就會觀察到更多趨同的現象。然而實際發生的情況是，隨著連結和整合程度的提升，我們也看到分化或是保護主義運動（protectionist movement）的出現。因此，全球史家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全球化的歷史，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全球史作爲一種方法也受到了批評。過去學界對這一個新的領域相當著迷，但如今我們看到也有對於全球史抱持批判的聲音，這個批評來自於不同的領域。有些學者認爲，考慮到當前的世界局勢，以及烏克蘭的戰爭、中美之間新冷戰的局面，世界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全球」，因此全球史也不像過去看起來那麼重要。此外，世界各地對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重視也激勵國別史的書寫。現在有許多歷史學家對全球史提出了批評，然而我覺得這些批評並不足以令人信服，他們急於斷定全球史所扮演的角色已經結束了。我個人的理解是，這當中的許多發展，包含新型態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和保護主義等，只有在全球視角的架構之中才能夠得到解釋。因此，即使看起來我們正在進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階段，全球史作爲一種方法和工具只會比以往更加重要。

Q: 誠如您所說，我們確實可以更注意區別當前全球化的政治問題與全球史的方法。

我們的下一個問題是關於研究方法的比較，我們將全球史的方法與臺灣學界的研究方法對比，觀察兩方如何處理歷史材料，發現兩方對待史料的方法不同。在臺灣歷史學界研究中，我們主要將史料放在核心位置，相較之下，理論和相應的方法，如性別、社會或全球史方法通常放在次要位置。有時，學者會因為未能將理論與他們的史料建立良好聯繫而受到批評。我們很好奇，在您的研究或者全球史研究中，您如何看待一手史料的位置？以及我們如何將一手史料與二手文獻更好地結合在一起？

A: 謝謝，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首先，我認為在早些時候許多人對全球史持懷疑態度。他們覺得撰寫全球史的書籍可以不使用一手史料，例如像是觀察世界各地的各種事物，但你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各地方的歷史文化。但我認為，這個階段早已過去。現在，學生和新興學者選擇非常具體的領域和主題來撰寫論文和研究計畫。總之，良好的全球史既需要有一手史料，也要兼顧理論基礎。沒有兼顧兩者，就無法產出一本真正優秀的全球史著作，一本能做到既有理論為基礎，也能明確地建立並深入根植在一手史料之上的「全球史」。從當前的研究趨勢來看，只鑽研實證檔案研究或只專注抽象理論的學者，他們的數量都極為有限。所以原則上，我認為當前我所舉出的理論方法是正確的道路。當然，歷史是一個能海納各種寫作類型的專業領域，我們既有的學術專著通常根植於史料，同時，還有一種綜合性的工作，適用於大學教材或者面向公眾的宏觀著作。我認為它們都有其價值，只是類型不同。但若具體談論學術和學者工作，我認為兩種取徑不可偏廢。

Q: 是的，這真的很重要，您也知道我們現在都是學生，嘗試結合兩種取徑來書寫歷史。當然，在實際操作上，結合一手史料和適切的視角仍然有許多困難。但當我們閱讀全球史研究時（尤其是您的著作），我認為您的研究引人入勝之處在於您在顧及一手史料的重要性的同時，也從不同角度處理二手文獻。這是我們真正好奇的地方，您如何平衡這兩者，不讓史料主導您的論點，但又同時不忘記史料的重要性？

A: 你說的完全正確，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挑戰。至少對我自己來說是。我舉個例子，這在研討會上也提到過。有一部學術經典是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著作，名為《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 2008)。<sup>②</sup>這是一本關於畫家維梅爾的書。他一直

<sup>②</sup> 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8). 中文譯本見卜正民 (Timothy Brook) 撰，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臺北：遠流，2009)。

在藝術史上研究已久，研究各種事物，而當人們看到維梅爾的畫作時都不免俗地專注在新的現實主義形式。他們觀察到畫作中呈現出的個人主義等等。然後，卜正民在某個時候反而決定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這些畫作。當他觀看一幅荷蘭小鎮的風景畫，他開始去看這幅畫如何傳達全球聯繫，即使乍看之下，一條河、幾棟房子、河上的小船似乎和全球沒有直接關聯，但他逐步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描繪出了這些景物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各種物資、中國茶的聯繫，然後讓畫中的世界重獲生命力。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這幅畫是我們的一手史料，那麼這個一手史料並不會大聲喊出「這是全球的！」。相反地，這需要像是卜正民這樣的歷史學家，去尋找、去發現那幅畫中別人沒有看見的全球聯繫。我認為這是歷史學術演進的典型特色。例如，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會研究啓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等，但不研究性別關係，然後性別史家出現，他們在完全相同的材料中尋找問題，有時甚至在沈默中發現性別話語。同樣的，全球史學者也必須這樣做。所以我承認，當我在研究某些東西時，我也拼命地尋找這些全球的聯繫。非常具體地說，我會問自己，在特定時點有哪些主要發展，比如民族國家的興起，自然科學的角色，新的性別關係等等；然後，我試圖在一手史料中找到這些過程的聯繫。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這是人工的（artificial），對吧？因為我確實試圖建立聯繫，我努力去建立聯繫。但另一方面，我認為，嘗試發現事件間的關聯就是歷史學者一直以來在做的事情。你覺得我的說法有道理嗎？

Q: 您說到「歷史學者發現沈默的事物」，我深感認同。從性別史的角度言，即使是沒有記載性別關係的文獻，也有連結與比較當時性別狀況的可能性。我們現在要將討論轉向另一個問題。延伸您以維梅爾畫作所做的隱喻，當在書寫臺灣史時，我們也正面對一幅繪製中的畫。我們並沒有任何草稿或框架可供遵循，只能在書寫中嘗試構造所謂臺灣史。進一步說，不像其他已經正式獨立的民族國家，臺灣仍需要透過釐清自身歷史，以及臺灣如何是一個「國家」，來逐步建構自身認同。我們的問題是，臺灣作為一個在民族與主權上尚未獲得界定的地區，要如何從全球史的角度參與對民族中心敘事的批判呢？

A: 是的，我理解了。我認為這裡最好把訪談的角色對調一下，我應該向你們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你們對這個問題的思索遠遠多於我。因為顯然我們的情況完全不同。我所居住的地方，德國，是個已經建立超過 150 年的民族國家。甚至理想上，德國認為自己應該更早便鞏固成一個民族國家。這種民族國家框架對歷史敘事的牽制非常強；對有批判意識的歷史學家而言，去指陳並摧毀這種力量，是十分自然的策略。而顯然臺灣得從另一個非常不同的位置來看待這個問題。

第一點，不涉政治現狀，僅從學理上說，民族國家在全球史中並不是一個有問題的存在。書寫全球史不代表避談民族國家這個主題。恰好相反，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出現是一個全球進程。這個進程約略在十八世紀晚期出現，席捲世界各地。從全球史視角來看，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發展並非一個內在的過程。固然它需要某些內部的利益團體與行動者，但這些團體與行動者實則互相聯繫，並回應了資本主義跨國系統的長遠發展。另外，民族國家不僅作為全球史的研究對象，也是全球史書寫的一種框架。從檔案到重大歷史現象，例如福利國家，民族的框架無處不在，也無從迴避。因此，我認為民族國家並不是全球史學家的敵人，而是全球史非常重要的主題。

第二點，歷史學家又要怎麼樣看待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政治影響呢？我看出你的問題中觸及臺灣很特定的處境。我充分理解建構某種民族認同，而非僅做為中華世界、漢字文化圈或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對臺灣社會來說是一個重要且迫切的需求。並且，我認為臺灣並不孤單，各種各樣「新」民族國家的歷史，例如歐洲的烏克蘭，以及許多後殖民國家，也面臨的同樣的困境。這些「新」民族國家甫從一個巨大的脈絡——典型來講是帝國——脫逸而出，它們感到創造某種民族主義或民族認同的需求。而這種需求，特別在一開始時，往往體現為一種反殖民的民族主義（anti-colonial nationalism）。而這種民族主義，允許我使用一個有點老舊的詞彙，往往具備一種「進步式」（progressive）的面向。但在這個情況下，歷史學家的角色是什麼？我自己的回答是，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們的目的是去指出這些民族主義永遠是建構的。在定義上，所有的民族主義都不可避免具有某種排他性的傾向，任何認同的建構都蘊含某種形式的排除。從臺灣的例子來看，很顯然這個國家的歷史是各種跨國力量的產物，例如移民與其他各式各樣的人群。因此，史學家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去對抗這種排他性的傾向，去揭示民族整體背後的多樣性。

而這樣的任務是否和你們所描述的政治目標相衝突？或許我們可以借鑑後殖民研究與性別研究。這些研究常採取所謂「策略性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即使所有女性顯然都不一樣，在女性主義運動中去宣稱他們有一種特殊的團結性，仍然說得通。同樣的，從後殖民的脈絡來說，說「我們全部都是肯亞人，因此我們想要脫離大英帝國的管轄」，也說得通，儘管顯然地，所謂「肯亞人」內部也存在巨大的差異。這種策略性的本質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我認為是說得通的。但同時作為一位學者，我們必須理解這是一種建構，而我們的任務也在於指出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論述並非一種本質，而是一種策略。

Q: 您的回應很有啟發性，提醒了我在方法上，性別研究與民族論述同樣帶有策略考量。另外，當我們在思考民族的問題時，我們認為全球史的取徑重在建立連結、境況與結構，改變我們既有觀看歷史的角度，不再只以某個地區為中心。您提醒到，



政治策略與歷史書寫的不同，而對我們來說，這兩者時常糾纏在一起。有時對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去解除這兩者的糾纏可能會相對困難。根據您的理解，有沒有任何後殖民國家的經驗，能顯示民族主義的發展如何影響歷史學的書寫？以臺灣今天的處境而言，主張臺灣獨立和臺灣是中國一部份的兩種民族主義政治立場，已和真實的歷史敘事深相糾纏。在後殖民國家中是否存在類似的例子，全球史或其他的歷史書寫方法能否協助解決這種緊張關係？

A: 我想在後殖民的脈絡中，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發展。例如在一九六〇年代，非洲國家紛紛走向獨立。當國家的邊界僅僅憑歐洲殖民者的利益而劃設，內在的多民族群體對創造一體感與認同便造成很大的挑戰。為了回應這個挑戰，坦尚尼亞的沙蘭港學派（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of African History）為一個以前從不存在的國家產出了大量的國別史研究。又例如烏克蘭，即使到了今日，俄羅斯仍宣稱不存在所謂烏克蘭身分，宣稱烏克蘭人都是俄羅斯人。但同時，早在十九世紀晚期，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已嘗試書寫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甚至嘗試從俄羅斯歷史的角度，來指出早就存在於烏克蘭的某種民族整體。因此，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種典型的發展。

但我理解你所說的，歷史書寫與政治策略的緊密相關。一個人怎麼能同時作為一位政治行動者，擁抱新的國家敘事，而作為一位學者，卻對民族高度批判且懷疑？這兩者互相衝突。我認為關鍵在於，「就我想要做的事情而言，什麼是有用的？」以德國的角度來說，全球史視角無比有用，不論在史學研究或政治議題上，它都挑戰了許多傳統與假說，也挑戰了許多亟力排除移民與殖民過往的歷史敘事。因此對我來說，全球史的議題，與我的政治關懷高度結合。而當全球史與現實境況的契合度沒有那麼高時，問題仍然是：在多大程度上，全球史對我想做的事情是有用的？我不認為所有的歷史研究都必須走向全球史，學理上或政治上，它有時甚至不是最重要或最具生產力的取徑。前段時間，我在柏林參加了一場對談，那是個夏季學院，也邀請了 Dipesh Chakrabarty，而大部分的學生都從東歐來。Chakrabarty 展示了他的研究取徑，並邀請學生們討論。大部分的學生都高度抗拒 Chakrabarty 的研究。他們認為自己是東歐人，不是殖民地，有關殖民主義的討論和他們沒有關聯。然後，Chakrabarty 說：「看，我只是告訴你們，我如何看待我這個部分的世界。你們可以從中拿走任何你們覺得有用的部分，拿走任何你們覺得有效的部分，其他的你們可以留在這。把這當作一個工具箱。」而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思路。將某種特定取徑從一處轉嫁到另一處，容易說不通，因為這些取徑會在不同時空產生不同的意義。

Q: 謝謝，我想請問您一個問題，您對於未來的史學家或是青年史學家是否有任何關於全球史的建議？這部分也是替這篇訪談的可能讀者而問。

A: 這是個簡單，但也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名學生，最重要的還是你的興趣為何。以我個人而言，當我發現全球史這種新取徑出現時，我感到極度興奮。它引領我進入各種方向，前往一個我先前未知的領域。它讓我得以開啓無數的討論。在我們全球史碩士學程的學生身上，我也發現同樣的現象。他們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多半已完成了自己的學士學業。從自己國家的歷史出發，他們在課堂上被捲入熱烈的全球史辯論。它像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不同的問題、不同種類的證據、不同類型的文獻。這讓我興奮不已。因此，當開始投入一個領域時，你必須要有熱情以及雄心壯志。只有當你覺得如此，全球史才是適合你的方向。

但就具體的策略建議而言，我會清楚地表明語言是從事全球史研究的重要技能。我會向我自己的學生說，在碩士及博士期間，這是一個人還可以學習新語言的時段。全球史明顯需要跨國視域，而無論哪種跨國視域都得益於不同視角。當我們能探索更多不同的地點，與越多人交談，在更多不同的地方檢閱檔案，就會擁有一個更完整、更深入，且更複雜的圖像，我們的分析亦然。因此，於碩、博士階段投入語言學習是使我們成為全球史家的重要步驟。這是我的建議。

Q: 第二個問題是，您如何以一個比較系統化的方式表達理論呢？您在您的著作《全球史的再思考》中處理了一個非常宏大的課題，我們想知道您是如何運用一種較系統性的方法去處理如此龐大的課題的？

A: 好，舉例來說，當我和我的學生談話時，我會說別讓「全球」一詞嚇唬住你，甚至可能連用都不要用這個詞。因為它聽起來就很大對吧？想成為一個全球主義的巨人看來是個過於艱鉅的任務，「全球」這個詞常給人一種嚇人的或者狂妄的感覺，所以我認為專注在某個點上，或者使用如跨國聯繫這類較小的詞，也是一種讓主題看起來更具可行性的方式。舉例來說，當你在寫碩士論文時，你在一個地方研究一本特定的期刊，並觀察當地政治與他地事件的聯繫，這是一個可行的計畫，但它同時也展示一個特定的地方如何和他地聯繫，以及行動者如何意識到發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意義的，或者是與自己的社會相關聯的。因此，從較能掌握的小事件著手，並畫出與之相關的所有聯繫，這是我的起手式。別一開始就叫它「全球」。

第二點，不要有理論的包袱，也不要去想我要如何在研究中呈現不同尺度，或結合不同取徑？相反的，要從計畫開始，從材料本身開始，而不是先看到那些聯繫。我認為，當你閱讀越多的理論或文章，你腦中就會有更多關於書寫全球史的好點子。你閱讀越多這些東西，你就能不經意地找到更多相似的發展、相似的聯繫等等。換句話說，先降低你的期望與自我壓力，而簡單從考察一些具有跨國維度的事件出發，其餘

的工作自然水到渠成。同樣的，全球史作為一種新典範（paradigm），它的希臘文原意提醒我們，學習典範的方式是從範例（example）出發。因此，我認為，與其讀《全球史的再思考》這類方法論書籍，不如閱讀個別研究論文或專著，尋找值得仿效的範例。我認為，範例就是研究者的最佳指南。我們不用去模仿或複製所有東西，研究範例會用具體的語言而非抽象的術語告訴我們聯繫是如何形成的。這是我認為該走的路，因為我認為不管對任何人甚至是我自己來說，全球史都是一個很艱鉅又龐大的任務。如果是在我 20 歲時，這將會更加地艱鉅。這就是我想說的。

Q: 我同意您的觀點，且您在《全球史的再思考》這本書中也提出了此意見。但是，處理一手史料與二手文獻其實非常困難。我們每天只有 24 小時，且我們必須先瀏覽所有的二手文獻，然後再回到一手史料。因此，學習如何平衡時間與閱讀範圍事實上是困難的課題。

A: 是！我在這邊快速註解一下我前面的說法：從一個計畫開始並慢慢找出聯繫。但是，在那之後，你或許會發現分析全球聯繫並非最有趣的論點，對吧？這個論點或許著重在文化變動、性別維度、微觀視角……任何更有效的詮釋取徑。換言之，敞開心胸。我們也許會發現起初想展示的成果，對讀者甚至對自己而言都不是最有趣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也沒關係，對吧？這不是個跟全球相關的論點，但仍可能是個更好的論點。

Q: 您曾在《全球史的再思考》中討論了多種研究工具，我們很想知道您怎麼看待像 ChatGPT 這類 AI 將在歷史研究和歷史學界扮演的角色？既然 AI 可能改變我們對於寫作的想像，您認為 AI 會是一個使我們寫作更加精準和有效率的工具，還是會成爲人文研究的潛在威脅呢？

A: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AI 正處於急速發展的階段，因此要評論它非常困難。

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你可能已經聽說，在義大利，ChatGPT 已被禁止使用。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包括馬斯克（Elon Musk）本人在內的這些 IT 專家現在都發出了警告，說道：「我們需要暫停下來，思考人工智能的未來。」比起他們，我不那麼悲觀。我觀察到我的同事們在兩個方面特別憂慮。首先，他們擔心我們如何知道學生是否作弊？事實上，我們無法知道。其次，因為寫作幾乎可以自動化，教師是否會在某個時候不再被需要？這兩件事都不是我最擔心的。我認為這是兩碼事：教學和寫作。

在教學方面，我預測 AI 可以教學生如何寫作，批改他們的論文，建議他們如何分析等等。在 AI 的協助下，教師也許會變得相對不那麼重要。我們作為教師的任務也許會減少，但更重要的工作在於教導學生如何理解（understanding）。理解字面上聽起來很簡單，但我談的是真正的理解——理解文本，理解論點，理解不同的觀點如何挑戰傳統認知等等。這將是教學的重點。最後，教師還需要教導學生關於引用的本質問題。我認為，我們只需要重新定義我們看待課堂和教學的方式。這樣，我們便不會把 ChatGPT 視為一種威脅，而會把它當作一種工具。換句話說，作為教師，我們自己會使用它，也會教授學生如何使用它，例如如何謹慎對待一些可能並非完全準確的結果。

其次，對一名寫作者來說，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將來有一天，小說，甚至是歷史小說，將由 AI 自動撰寫。比方說，我需要一部塞內加爾的歷史，也許 AI 能寫出一部很好的塞內加爾歷史，幫助我這個非專業人士。目前我也嘗試用 AI 寫作，比如我有時候會實驗 ChatGPT；我認為 ChatGPT 的寫作可以達到及格的水準，但並無法如我想要的那麼精準。因此，就此刻的發展而言，我不認為 AI 真的會取代我們。當然，我們越是使用機器不知道的一手史料，就越需要我們投入勞力和能力。我的感覺是，我們仍然需要專家來寫作。但對於介於兩者之間的實用寫作來說，ChatGPT 將確實成為幫助我們的工具。

Q: 非常謝謝您的分享，我們收穫良多。